鹅岭三部曲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程华照



一

到鹅岭，别人一头钻进菊展，围得水泄不通。我上前探视，菊花丛中搁着一抬花轿，明清红木款式。对开门上椭圆的开窗里，浮雕一组带故事的鎏金古代人物，男的骑马远行，女子伫立门边挥手惜别。

“芝兰百世昌，鱼水千年合”，轿上对联告诉主人的来头。人们踮起脚尖把目光投向它，好似在等待一位姑娘，披着面纱从里面姗姗走出来。

跨步进入江南水乡苏州园林，池塘碧水含翠，瘦荷茕茕藏情；一竿烟雨的乌篷船，周围青石篱笆，流水花卉作隔断，打造出不同的区域，楼阁回廊亭子，掩映在古树竹林间。临江围墙的窗户，对对少男少女框在里边英姿绰约，或才下眉头，或惊鸿一瞥。不想挤进去，悄然溜到一边寻找自己的乐趣。

鹅岭花开得灿烂，盆景也不逊色。它赏的是骨骼，玩的是沧桑。罗汉松青春四溢，虬枝斜出，草草几笔，长成书法的样子；茶花婀娜多姿，笑迎寒风，泛出抹抹猩红，等几个太阳几场雨来剪彩。我漫步在一盆金弹子面前，憨憨的老桩黑不溜秋，一对年轻的双枝从枯萎处长出，相依相伴，你开你的花，我结我的果。

“鹅岭”碑前，我不吝啬镜头，来一张吧，拿回家和相册里的对比，同样地方同样的人，“许我再少年”。

儿时读四方井小学，年年都要到南山看樱花、到鹅岭观菊。晨风拂晓、红领巾飘曳，我们途经人民路、上清寺、中山路、国际村。抬眼一瞥，面前均是陡峭的梯坎，一坡又一坡没完没了。带队的彭老师见状，回过身双手捂住嘴嚷道：“走这么久，同学们歇不歇一下？”我们处在兴奋中，知道爬上山离公园不远，不由得扯开嗓子回答：“老师，我们继续。”

天气好时，我和三哥约起到鹅岭去溜冰，那儿磨石的地面宽敞平坦，聚集了许多溜冰高手。我们穿上冰鞋，抓住栏杆蹒跚学步，手拉手地滑行。汗水溢出大口喘气，我们倚在栏边打望。一对妙龄青年，男的穿条纹花衬衫，豆色喇叭裤，女的一身洁白短裙，两人出尽风头把溜冰当成了演出。时而一前一后，燕子似的从人们眼前掠过；时而蜻蜓点水，金鸡独立……我和三哥看呆了，和大家一起把掌声送出去。

记忆还在，溜冰场不见了。此时，我在公园溜达几圈，却惊喜找到一处开放不久的栈桥，正想进去却被工作人员拦住：“栈桥是单向的，那边是入口。”

二

拱门边，冯建吴题字“佛图关公园”。观景台入口处，鹅岭栈桥穿行在山中密林里，酷似一条飘逸的彩练。千仞绝壁、临江伴岩，跌宕起伏于林中荒野，险、峻、奇均揽入怀。脚踏栈桥，心怦怦跳动起来，身体轻飘飘好似在云端行走，生怕被一阵大风刮走。路人见我惊慌状，调侃说：“这桥没过渡，对于恐高的人来说，还是回到岸边，适应一会儿再走。”

只得停下脚步，游人如织从身旁走过，谈笑风生说起：“不怕，加油！大起胆子往前走。”有位哥子，状况与我差不多，手捏得紧绷绷，脚怯生生地走。友人上去搀住他说：“来，我扶着你走！”哥子斜起身子咂咂嘴，用力掀开对方的手笑道：“这点高算什么？瞧，我走给你们看。”

我再次走上栈桥，到处张望来与恐高和解：里面坡坡上的房子，半山腰的危岩，空中翱翔的飞鸟……渐渐我可以低头折腰，开口和别人搭讪，握住手机相互按“咔嚓”；遥望对岸都市的楼群，波光粼粼水中的大桥，开往春天的轨道列车。

荒坡两棵广柑树，亭亭英姿，枝繁叶茂间，花悄悄开果子大胆挂，红红火火笑对过往的游人。

终点处的鹅岭制高点，栈桥顿时螺旋绕圈子往上爬，人们走着走着不由得减速慢行，驻足看风景发抖音。我倚在栏边喘气，空气有了颜色，风有了样子。思忖，雨天若是你到这儿来：一帘清欢，一帘朦胧。

三

公园、栈桥、二厂轰轰烈烈，将鹅岭街巷炒红。坡坎上、悬崖边，栋栋厂房车间，打通墙壁用铁楼梯连接，请年轻的老板入住经营文旅，吸引游客蜂拥前来。

坎下有家豆花土菜馆，看见它肚子便“咕噜咕噜”吵翻天，瞅时间快到下午1点，难怪！坐在桌边扫二维码付款49元，少顷豆花、凉拌豇豆、蹄花汤端上来，舀上两碗甑子饭，觉得还不够：“老板，来两瓶山城啤酒。”一边吃，一边欣赏墙上的涂鸦，感受制作豆花的过程，不觉酒足饭饱。

大厅中央搭建的平台，摆着一挺重机枪和一挺轻机枪。胖子姐姐歪起身子抓住手柄一阵扫射，嘴边冒出“嗒嗒嗒”声。楼梯间“战争时期重庆兵工厂的枪支”下面，多半是汉阳造的手枪、冲锋枪、步枪。我上去依次触摸着，脑洞里弹出战火纷飞硝烟弥漫。

马登工装的石头房子，威武酷气满满，四周开有红色的窗，这种复古的味道惹来不同年龄段的人们排队拍照；对面的房屋，外墙一块块脱落，露出地图式的版本，青砖墙上挂着的木牌写着：民国中央银行印钞厂旧址，落款为“重庆鹅岭正街1号”。邻里“麻将研究所”绿色的店铺，门外一个白色繁体字“发”霸占大半墙壁，一大姐上前死死搂住，路人憋不住挠头嬉笑：“到这儿来又不是打麻将搞自摸的，想发，干脆把这字抱回家。”

停在“你好童年”的店铺前，门两边橱窗装满我的童年记忆：那些年，我们一起吃过的牛肉干、玫瑰米花糖、合川桃片、耗儿屎、怪味胡豆等；那些年，我们一起听过的刘三姐、邓丽君、费翔、张明敏、郑绪岚，以及谢莉斯、王洁实对唱的校园歌曲。

哼起小调迈入，里面轻奢怀旧的装饰还原当初：照相馆、解放电影院、大田湾歌舞厅、轮渡、山城宾馆，一个个熟稔的字眼扑面而来。黑白显像管电视仍在亮着，落地风扇“呜呜”摇头晃脑，货架摆满搪瓷盅盅、肥皂洗粉、糖果香烟、花露水、健力宝、重庆啤酒……刚掏腰包买了一袋盐花生，转眼看见冰柜，上前询问：“老板，有青鸟汽水吗？”

背僻处的二厂老茶馆，远离尘嚣，被树木掩盖。崖边坝子，竹桌椅上摆着盖碗茶，客人一边喝茶，一边说悄悄话。

站在梯坎上，打量自己走过的二厂，陈旧沧桑，锈迹斑驳，那均是风雨中的胎记，登台后的卸妆。



从未褪色的战旗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米曲

教学楼门厅的玻璃展柜里，放着一面旧战旗。调入新学校两年了，我每天上班、下班都从它面前走过，却从未停下来看它一眼。我总觉得“战旗”离我们很遥远，“战旗漫卷”是电影里才有的画面。



直到那一天，96岁的文厚成老人穿着笔挺的旧军装来到我们学校，胸前的军功章被朝阳擦得锃亮。他走向国旗，抬手敬礼，五指并拢，动作非常标准，但右手抬到半空时微微顿了一下。

我们学校地处城乡接合部，学生父母大多是在城里务工的租户。孩子们身上带着山野的莽撞，也带着缺少陪伴的茫然：上课趴着补觉，活动不愿参与，手机比课本亲，作业有大半人交不齐。校长说，孩子们心里没根。于是，他把这面战旗带进校园。

校长还把老人请进学校，为全校师生上了一堂思政课。不讲战场上的轰轰烈烈，只说那片连岩石都被炮火翻开了几遍的阵地。阻击战最胶着的时候，指导员把战旗塞进他怀里，喊了一句“人在旗在”后，便抱着爆破筒冲了上去。就着雪水吃冻土豆，土豆冻得跟石头一样，得先揣在怀里捂软一层，才啃得动一层。旗面上的补丁，是从牺牲战友的衬衣上撕下来的；那一块压着没写完的家书，血漫过纸，洇到布上了；针脚歪歪扭扭，是趴在坑道里借着炮火的光缝上的。老人的战友换了一批又一批，战旗补了又补——每一块补丁上都缝着一个名字，缝着一个理想，缝着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故乡。

这面旗早已辨不出最初的鲜红，炮火把它熏成沉暗的赭色，像凝固的血，也像烧焦的土。老人声如洪钟：“战友们最大的心愿，就是保国家独立，护人民安稳。现在，该你们上场了。”

操场上没有一个人讲话。阳光斜射在战旗上，斜射在那些补丁上，像一只只沉默的眼睛，也像一张张没来得及说话的嘴。

文厚成老人1930年10月生，1951年3月入伍。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，遭敌机轰炸，左腿、右腿、右手共9处负伤，取出弹片9枚。1957年退伍后，他放弃担任乡党委书记、县邮电局科员的工作。再后来因为国家需要，成为村小代课教师。

我忽然明白，我每天站着的三尺讲台，身后也连着一个战场。

《礼记》里说：“行远自迩，登高自卑。”“卑”指低处，整句的意思是：走远路，必从近处起步；登高处，必从低处开始。是啊，战旗从来不是一步就能插到山顶的；“人在旗在”也不是一句空泛的豪言。

我的战场有一间教室那么大，对手是孩子们的蒙昧和荒疏；我的武器是粉笔、黑板、几十个孩子的笑声和书声。

我把之前应付式的电子教案全部导出，进行复备，在每一页的边栏上，标注出不同层次学生的接受节奏，基础薄弱的孩子我就多举两个生活中的例子，思维活跃的孩子便留一道拓展思考题。我把“一言堂”的上课习惯改掉，每节课留足15分钟的时间进行分组讨论。我推行分层作业，不是用统一的习题要求所有孩子。我把在教学平台上生成的学情分析打印出来，贴在办公桌边，每一周对着学生错题库，调整我讲课的侧重点。我教案上的红笔批注，比正文要多得多。

自主阅读、主动思考、爱问老师问题的学生，越来越多了。

那个爱打游戏的男生，我把他的座位调到第一排，每天给他留三行最基础的古诗文填空，做对了就给他贴一张小小的红旗贴纸。那个要辍学的女生，我将这半学期她的作业、表现积分、奖状等，一张张摊开给家长看，聊了两个多小时，家长终于答应不让她去打工。

我们这一代青年，不必人人都走上硝烟弥漫的战场，但人人都有自己的阵地，如医生，一盏彻夜不熄的值班灯，一份不肯潦草的病历，一个不肯轻易放弃的病人；如警察，一条来回巡逻的街巷，一份不肯马虎的笔录，一次明知有险也不肯后退的出警。守好自己的阵地，就是“人在旗在”；做一个良好公民，就是“让祖国强大”最深情的注释。

我小小的影子，被阳光拉长，映照在这面旧战旗上，脉脉而闪亮。原来，战旗从未褪色，它只是化作了千万个不曾退让的身影，静静地立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。